

忠雅堂集校箋

一

〔清〕蔣士銓著
邵海清校
李夢生箋

忠雅堂集校箋

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本書出版得到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忠雅堂集校箋

(全四冊)

〔清〕蔣士銓 著

邵海清 校

李夢生 箋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60×1186 1/32 插頁24 印張 82.625 字數 1,570,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200

ISBN 7—5325—1291—6

1·635 平裝定價：72.95元

前言

清代乾隆時期，開國已歷百年，政治漸趨穩定，經濟日益繁榮，統治者採取恩威並施的政策，知識分子大多潛心典籍，學術文化呈現蓬勃發展的勢頭。詩壇人才輩出，流派紛呈。袁枚首創性靈說，與蔣士銓、趙翼並稱「乾隆三大家」。他們共同主盟乾、嘉時期的詩壇先後垂五十年，並在各自擅長的文藝、歷史、文學批評領域中作出過獨特的貢獻。蔣士銓的詩詞古文素負時譽，他的聲名遠播海外；他所創作的戲曲，乾隆時期即已「流播藝苑，家豔其書」（張埴冬青樹序）。他是以詩人而兼戲曲家被載入中國文學史冊的。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晚號定甫，別署離垢居士。他的先世本姓錢，原籍浙江長興，祖父承榮，字靜之，幼時值明末亂離之際，流徙至江西鉛山，為蔣聖寵嗣子，始改姓蔣。他的父親名堅，字非磷，號適園，慷慨仗義，有古俠士風，又精刑名之學，屢拯人於患苦之中。母親鍾令嘉，字守箴，自幼從父讀書，敏於才思，晚年自號甘荼老人，著有柴車倦遊集。

清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十二月二十八日，蔣士銓誕生於江西南昌。幼年家境清寒，但卻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於父親長年奔走在外，他從小就跟隨母親寄居在餘干縣瑞洪鎮外祖父鍾志順家。四歲，母即授以四子書，斷竹簾排撇畫，教他認字。外祖和諸舅也都關心對他的教育。九歲，母又授以禮記、

周易、毛詩及唐宋人詩。十一歲，蔣堅攜家人偕遊齊、魯、燕、趙等地，縛士銓於馬背，歷覽太行、王屋之勝。入山西澤州，館於鳳臺王鏊家者十年，得讀王氏豐富的藏書，以是學業日進。二十歲，全家束裝南還，旋卜居鄱陽。次年，娶婦張氏於南昌。二十二歲，還鉛山應童子試，督學金德瑛拔士銓第一入縣學，對他的試卷倍加贊賞，以「喧啾百鳥羣，見此孤鳳皇」二語評之。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二十三歲時，舉於鄉。

但是對蔣士銓來說，科舉的道路並不平坦。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赴京會試，被放。這年十二月，他的父親去世。一度生計無着，曾應南昌縣令顧錫鬯之邀，主持編纂南昌縣志。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自鄱陽移居南昌。是年秋，應禮部恩科試，雖經房師力薦，終因「主司以江西春秋已中六卷，不再閱」（清容居士行年錄）而落第。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再應會試，又因謄錄以表文不敷謄寫，稟請加頁不許，「遂暗貼於明遠樓下」（行年錄），再次被放。同年，考授內閣中書。不久，告假回鄉。於次年秋冬間，迎家眷至京。

蔣士銓在仕途上也並不順利。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三十三歲時，得中二甲十二名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先後充任武英殿纂修官、順天鄉試同考官、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在京任職期間，他雖然聲譽日起，名公卿爭以識面爲快，却居官不遷。他賦性耿介沖淡，不諧於俗，承認自己「拙於仕宦」，並不無感慨地說過：「從俗豈不好，竊懼傷直性」，「我性厭喧雜，豈能與俗諧」（雜詩四首之一、之四）。袁枚也說他：「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翰

〔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誌銘〕他的這種脾性，自然容易開罪於人，並與當道者不合。和他同時官翰林院編修的趙翼送蔣心餘編修南歸詩之二：「敏捷詩如馬脫銜，才高翻致謗難鍼。」（自註：「有聞之於掌院者，故云。」）自是事出有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在行年錄中所說：「裘師穎薦予入景山爲內伶填詞，或可受上知，他自然不願也不屑通過這樣的途徑希求置身青雲，於是「力拒之」，進而堅定了他辭官歸去的決心。因此在京居官八年之後，當四十歲盛年時，乞假養母，繪歸舟安穩圖並作歸舟安穩圖記以明志。這一行動得到他老師金德瑛的贊同：「君行其志可耳，又奚疑？」（忠雅堂詩集序）更得到他母親的欣然支持，並首題歸舟安穩圖詩七首勉之。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蔣士銓奉母攜眷，撥棹南歸，僑寓金陵。他對雞鳴山（即雞籠山）下的新居以及乍離官場、退居林下的「寓公」生涯頗爲滿意。且其居處與袁枚相隣，二人時相過從，極詩酒盤桓、切磋唱酬之樂。

然而，「本無田里可躬耕，奉母來棲白下城」（尹望山督相招飲同袁簡齋秦礪泉兩前輩席上作之二），蔣士銓在家鄉既無田地可資生產，金陵也終非久留之地，「失官去微祿，饑色漸如故」（詠懷三首之三），他不能不爲衣食考慮。「自揣宜教授于鄉」（金德瑛忠雅堂詩集序），原是他的素志，適浙江巡撫熊學鵬致書延請，遂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初夏，應邀前往，主紹興戢山書院講席。翌年，舉家赴會稽，居天鏡樓。在戢山，他與老詩人劉文蔚訂忘年交，「性情文字，相餉無虛日」（越州七子詩序）。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歲首，原擬應李清時之招赴山左，以生徒輩鼓噪力爭，乃留杭州崇文書院六十七

日，仍還蕺山。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春，復應兩淮鹽運使鄭大進之聘，主講揚州安定書院，寓於芳潤堂。其間，與揚州八怪之一的羅聘，詩畫往還，交誼甚篤。他六載于越，三載于揚，除悉心教授生徒，甄拔寒畯外，還致力於山長的份外事，如建議修蕭山富家池石堤和重修三江應宿閘，他曾力言於巡撫，並一再致書寧紹台道潘蘭谷，為修梅花嶺祠堂和史公衣冠墓，他也曾向運使進言，後又通過同年彭元瑞以史可法畫像卷入奏，終於奉敕建起了祠堂及御書樓。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正月，蔣士銓的母親病逝於揚州。六月，扶輿登舟返里。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夏，舟過蕪湖，蕭公渡，以類風顧亭，錢湖行裝蕩洗，詩卷淪沒。在南昌，他修葺了一所頗具規模的園林——藏園，打算在這裏度過他的餘年。其時，乾隆帝南巡，賜彭元瑞詩有云：「江右兩名士，汝今爲貳卿。」註云：「其一蔣士銓，與元瑞同年入翰林。」因感念乾隆帝的垂注，遂萌再度出山之想，加之彭元瑞書數敦促，五十四歲的蔣士銓，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早春離家，再次入京。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充國史館纂修官，專修開國方略十四卷，記名以御史補用。復因患風痺之疾，於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春夏間，買舟南歸，養病於南昌藏園。這時他右體偏枯，猶用左手作字，舌本牽強，仍復耽讀不倦。袁枚過訪，他抱疾作陪，囑爲藏園詩作序，並手書生平事略以示。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二月二十四日卒，終年六十一歲。

蔣士銓晚年在述懷一詩中回憶自己的過去，從「苦懷經濟心」，到「慷慨歸來休」，從「感激再出山」，而感到「宦海如沉浮」，他的仕宦生涯是落寞的。雖然他的才名傾動京師，甚至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稱許，然

而他並沒有真正受到重視。他徒有熾烈的用世之心，現實却始終沒有提供給他可以一展抱負的用武之地。三十年中，當時同被目爲「江右兩名士」之一的彭元瑞置身通顯，官至禮部尚書，而他垂老不過是一個「七品歸田老史官」（張舟第二碑題詞）。也因此，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於講學授徒和文學藝術創作之中了。

袁、趙皆享遐齡，蔣則僅得中壽，但他們都是畢生勤奮作詩。小倉山房詩集存詩近七千首，甌北集存詩五千餘首，忠雅堂詩集則存詩二千五百首左右。所幸的是北京圖書館今尚藏有蔣清容先生手書詩稿（其中缺辛巳、丁亥至壬辰、癸巳之大部，己亥至甲辰各年所作詩），雖非全璧，與刊本相較，已多出近一倍，合計存詩四千九百餘首。趙翼所謂「三家旗鼓各相當」（袁子才挽詩），僅從詩的數量看，亦非虛語。

三家詩論，互有同異。袁枚有隨園詩話，趙翼有甌北詩話，蔣士銓並無詩論，詩話一類的專著，他所撰的定龕瑣語今已不可得見。他的論詩之作，散見於其詩文序跋之中。以詩論詩，是他詩集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蔣士銓的論詩之作，多爲五古、七古，其中大量的的是五言六句，爲其創格。如論詩雜詠三十首，評論了自楊維禎以來有代表性的詩人三十一家，較系統地表達了作者對各種詩歌流派的見解。他所寫的系列「懷人詩」，不下一百二十首，或摹繪其人品，或品味其詩作，可看成是當代詩壇的掃描錄。而集中表現他的詩歌和文學主張的，則莫過於文字四首和辯詩二首。文字四首之一云：「心與文字會，飄飄起春雲。又如春江流，波瀾了無痕。……平時讀書力，醞釀即漸醇。此境不易到，可爲知者論。」其

四云：「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李杜韓歐蘇，異曲原同工。君子各有真，流露字句中。氣質出天稟，旨趣根心胸。……後賢傍門戶，摹仿優孟容。本非偉達士，真氣豈能充？」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變出不得已，運會實迫之。格調苟沿襲，焉用雷同詞。……奈何愚賤子，唐宋分藩籬。……」李杜若生晚，亦自易矩規。寄言善學者，唐宋皆吾師。」這與他在一些詩序中所論恰可互為印證。

古今人各有性情，其所以藉見于天下後世者，於詩為最著……曩與同學二三子論詩，首戒蹈襲，唯務多讀書，以養其氣，于古人經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鍾叔梧秀才詩序）

夫辭必已出，意必自陳，文章所著，流品傳焉。苟執唐宋之說，強為低昂，互相詆誚，是皆不能自立之士。（沈生擬古樂府序）

若斤斤與前賢論宗門，守繩墨，較工拙，講聲病，雖極盡能巧，而其中無物焉，是亦苟作而已矣。（胡簡麓秀才詩序）

夫學無常師，人貴自立，何南北之足云。（邊隨園遺集序）

綜上所述，蔣士銓論詩首戒蹈襲，亦步亦趨，主張脫去依傍，自立門戶，他反對規唐模宋，互為低昂，主張博取衆長，唐宋皆師。他認為詩應以性情為本，各有自己的面目，強調多讀書，以期學有根柢，於學中求「變」，即在繼承中有所創新。在創作方法上，他反對拘守前人繩墨，講求形式技巧，言之無物，主張辭必已出，意必自陳，表現真實的思想感情，而又能自出機杼，進而達到「醇」的境界。這些見解和主張，確有超越前人之處，並與袁、趙同聲相應，對當時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詩風起過振衰

救弊的作用，是有針對性和進步意義的。不過，對於性情的理解，袁枚認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答沈大宗伯論詩書），重在獨特的個性和真情實感，蔣士銓則強調「性情之正」，即所謂「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鍾叔梧秀才詩序），一切以不悖於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傳統的詩教為依歸，從而暴露出他思想意識上偏執保守的一面。

以詩論史，是蔣士銓詩作中另一類常見的題材。作者因為曾經「忝列史官」，所以經常想到自己的職責，並以春秋時的「良史」（南史氏、董狐自律：「安青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訴相思？」）（中州愍烈記題詞之四）他對歷史有着濃厚的興趣，不僅戲曲創作多半採取的是歷史題材，而且還寫下了不少詠史詩。或讀史興感，或懷古寄慨，或表達仰慕之情，或予以諷刺鞭撻，縱橫捭闔，議論風生。史可法是他崇敬的一個歷史人物，他二十四歲第一次經過揚州，寫了梅花嶺弔史閣部，以後在北京得史可法遺像及家書真迹，藏閱十載，在揚州，為建立史公祠堂盡了最大的努力，直至五十四歲再次北上途經揚州時，又寫了梅花嶺謁史忠正祠墓：「十六年心事，重來一拜中。……梅花含笑處，不與舊時同。」他為此感到欣慰。文天祥是他景仰的又一個歷史人物。他曾經請杭州鮑綠飲秀才別寫文天祥像，與史可法像並藏於家。在題文信國遺像詩中，他把史可法比作是文天祥「再世」。晚年還根據文天祥的事跡譜寫了長達三十八齣的冬青樹傳奇。作者敬仰他們的民族氣節，歷久彌深，應該說並非出於偶然。對王安石的評價，歷來褒貶不一。讀荆公集、題荆公集後、讀宋人論新法劄子等詩，力排舊說，獨抒己見，對王安石的歷史功過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止水亭弔江文忠公萬里、謁于忠肅公祠墓歌頌以身殉國的江

萬里和于謙，辭意深沉。讀秦始皇本紀揭露秦始皇的暴虐和愚昧：「既欲求神仙，如何穿冢穴？」苟能得長生，神仙亦盡誅！「諷刺辛辣入骨。響屨廊之二：「不重雄封重豔情，遺蹤猶自慕傾城。憐伊幾兩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委婉含蓄，啟人深思。朱庭珍譽之爲：「用意沈著，又七絕中之飛將也。」（筱園詩話卷四）

蔣士銓還以詩來論繪畫、書法、戲曲等。他對繪畫有特殊的愛好和相當高的藝術鑑賞力，寫過不少題畫詩，其中不乏佳構。如題鄭板橋畫蘭送陳望亭太守有云：「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韻調。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疎花見姿致。下筆別自成一家，書畫不願常人誇。顏唐偃仰各有態，常人盡笑板橋怪。」字畫同源，不同的藝術門類本可以相通，詩中寥寥數語，揭示了鄭板橋書畫超塵絕俗的獨特風格。蔣士銓精於書法，風神透逸，字如其人。論書一首題梅庚山（德）臨摹冊子後把學書與讀書、書品與人品聯繫在一起，亦是深得個中閫奧，非斤斤着眼於技法的庸廓之論。

在蔣士銓詩作中，令人矚目的是他所寫的一些樂府詩，如京師樂府詞、豫章樂府詞、國原新樂府等，大抵一事一題，即事命篇，富於現實主義精神，在同輩詩人中罕見其匹。京師樂府詞十六首是他任翰林院期間所創作的組詩，尚鑒賞譽之爲「兼元、白、張、王、鐵崖、西涯之勝」（三家詩話），它涉及到京城的民情習俗、市井百態，難得的是他的筆觸深入到社會的底層，描寫了民間藝人的卓絕技藝，官妓的賣笑生涯，下層士卒的艱辛勞動，以及掙扎在死亡綫上的乞丐、縫窮婦的悲慘境遇，爲我們提供了十八世紀中葉北京社會風俗的巨幅畫卷，同時也揭示出「風氣妖邪此爲極」（戲旦）的都下惡習以及隱藏在

「太平盛世」背後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擬古樂府三首則通過關係羣衆切身利益納糧、高利貸、獄訟三事，揭露官府不顧人民死活、肆意盤剝的罪惡行徑，也是切中時弊的。

蔣士銓是一個關心民瘼的詩人。他本出身寒門，長期的京官和山長的生涯也是清苦的，有時不免陷入「朝衫豈惜因糧賣，彩服終當爲母留」(典衣)的窘境，這使他思想感情上較爲接近人民，並關心他們的疾苦和痛癢。嶧縣道上，自夏鎮赴南陽有述寫道經山東，目睹黃河泛濫，農村瀕於破產的蕭條淒慘景象，饑民嘆、後饑民嘆寫南陽一帶淫雨連年成災，饑民流離失所的情景，都使人觸目驚心。飛蝗寫揚州附近蝗災的爲害之烈：「雨壓連畦爛，風間隔縣驚。黃雲千畝闊，一夜爾鋪平」，也足以令人不寒而栗。意味深長的是詩中竟以「平山花月舫，歌舞過閭閻」作結，與「淮浦流亡最，江鄉疫癘兼」的現實構成尖銳的對比，說明豪門貴族祇顧尋歡取樂，是不會把人民的苦難放在心上的。儘管如此，爲了達到「吐辭勵冠弁」、「補助及淪胥」(自夏鎮赴南陽有述)的目的，他還是孜孜不倦地以詩筆作武器，爲民呼號。有時他忽發奇想，希望上天降下的雨雪，竟然是可以使窮人免於饑寒的糧棉：「安得天雨粟，一卒饑鴻歲！」(小除日在南昌有作之二)「關心萬姓無衣者，安得求他化作綿！」(立春前一日喜雪之六)這種民胞物與的胸懷，至老弗衰：「不辭心力竭，猶爲染霜毫。」(蕉溪壩)

在忠雅堂詩集中，還留下了大量寫景記遊之作。蔣士銓少年時代，曾隨父親北遊燕趙，成年以後，又多次隨金德瑛使車遊歷。他三上公車，五度出入京師，以後設教東南，頻繁往來於江、浙、贛、皖等地，足跡半天下。所過之處，登臨山水，憑弔勝跡，輒有題詠。長篇之作如偕袁簡齋前輩遊棲霞十五

首、吼山紀遊五首、遊蘭亭五首，縱筆揮灑，逸興遄飛，覆車紀行五十五韻、蕭公渡覆舟記述他旅程中兩次遇險、死裏逃生的經歷，讀來令人揪心。而更多的是即景生情、感興述懷的五七言律絕。金山、出彭蠡湖、盧溝橋二首、望廬山積雪，寫得境界開闊，氣勢不凡。而那些描繪水鄉景色、農村風物的小詩，更是佳句疊出，「浪靜聞魚擲，雞鳴覺市遙」（晚稻），「曉烟浮海氣，夕網掛冬晴」（江泛之二），「岸柳斜侵虛幌鏡，汀花閒撲晚筵杯」（舟中），「幾人春鬢白成雪，十里菜花黃到門」（田家小憩有作），清新雋永，俱堪入畫。鄱陽竹枝是他青年時代所作，描畫家鄉景物，也是一組富有民歌風味的好詩。

蔣士銓曾自述其學詩的經歷云：「予十五齡學詩，讀李義山愛之，積之成四百首而病矣，十九付之一炬。改讀少陵、昌黎。四十始兼取蘇、黃而學之。五十棄去，惟直抒所見，不依傍古人，而爲我之詩矣。」（學詩記）他早期的詩學杜甫、韓愈，中年以後，兼取蘇、黃，而以黃爲主，即所謂「好詩近耽黃魯直」（十八夜露坐東穀原之二）是也。但他並非單純地蹈襲模仿，而是遺貌取神，重在風骨格調。這一點，他同時代的詩人兼摯友劉文蔚、高文照等在手稿本的評語中屢經指出。如評太行絕頂曰：「格調直逼少陵。」評止水亭弔江文忠公萬里曰：「少陵遺響。」評喜晤張吟鄉秀才填曰：「通篇神似昌黎。」評弋陽舟次曰：「合昌黎、山谷爲一手。」蔣士銓擅長於五七言古詩，七古尤勝，十八灘、三峽澗、天全宣慰使歌爲楊公翊清賦諸篇，生新老辣，大氣盤旋，頗得昌黎、山谷之助。但也有的長詩用奇字僻典，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墮入過於追求奇崛險怪一路。如羅旭莊前輩既移庖廚於書室聖舊庖屋爲飭齋要同人賦全韻詩落成予得十賄六十韻，堆垛斧鑿之痕，過於明顯，袁枚嘗評之曰：「用險韻有意鬪多，昌黎亦有此

癖，然終不如仆牆一首動人心目，何也？一以天趣勝，一以人力堆也。」這批評是切當的。蔣士銓還喜用和韻、疊韻，有時倒押前韻，連篇累牘，矜才炫博，凡此，均不足取。

「耽吟亦是平生癖，消瘦何妨減帶圍」鄉夢再用前韻，蔣士銓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終於領悟到繼承傳統是爲了創新自立，學習前人還必須能擺脫前人，具有自己的面目。所以，他後期的詩便努力擺脫依傍，直抒所見，而爲我之詩，並力求出之以「自然」。其寄懷袁丈易齋之四云：

山中築草堂，道味老益腴。悠然寫心懷，雲行水舒舒。靈源澹空明，不見淵與魚。所言孕名理，妙義煩含咀。蘇公和陶詩，尚落迹象餘。至論歸自然，不在通羣書。

很可以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醇」的境界，也即張埴在冬青樹序中所盛贊的所謂「老境」：「文章爛漫易，老境難。老而乾瘠，非老也；老而健，老而腴，刊去枝葉，言無餘贅，此爲老境，非少年學人、才人所可幾及也。」蔣士銓晚年所作，如蕭公渡覆舟、東流阻雪戲作、題謝兩峯畫幃額、再示知讓三首等詩，不用典實，屏去雕飾，直達所見所感，舒卷自如，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在蔣士銓所留下的近五千首詩中，題材廣泛，體式多樣，以上僅就其主要方面作了概括和評述。另外，集中還存有專收應制詩的簪筆集一卷和散見於各卷之中的歌頌忠孝節烈的詩篇，作者自己對此頗爲重視。而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些作品大多沒有甚麼價值。

蔣士銓兼工詞曲。刊本銅絃詞上下卷存詞二百零八首（附南北曲十二首），與之相較，手稿本多出詞四十二首，曲三首。蔣詞骨格清奇，一如其詩，或出以深情，則纏綿婉曲。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每以

其時雜詩句、曲句短之，其實這正是他寫詞時放得開處。集中慢詞最多，舉凡寫景、送懷、記遊、贈別、題畫（圖、照）、題詩（詞、曲），無不得心應手。但像玲瓏四犯程十七判官有侍兒能吹橫笛者書簞贈之、賀新涼賀友人納姬、虞美人秋雨停尊圖爲阮吾山舍人作、江月題歸舟醉吟圖、齊天樂壬申下禮部第出京宿良鄉同是寫鏢羽南歸旅次中意興蕭索，可謂異曲同工。但兩者的結句，一爲「時來風送，明年還到京雒」，一爲「飽喫黃粱，擁衾眠一覺」，其心境又自有微妙的不同。至於像賀新涼疊韻留別紀心齋戴匏齋下闕中所說的「猿鶴形骸麋鹿性，未可久留亭墅」、混臣是、孤生寒窶。袞袞諸公登臺省，看明時、無闕須人補。不才者，義當去。」反語正說，明是直白的牢騷話，其憤慨之情，溢於言表。陳廷焯則特別贊賞浮香舍小飲四章、二十八歲初度兩章，謂其精神團聚，意境沉痛，可以步武板橋，爲集中完善之作（白雨齋詞話卷五）。

蔣士銓的古文，爲他的詩名、曲名所掩，前人論評較少。其實他的散文，亦自卓然成家。忠雅堂文集十二卷，收文二百四十九篇（其中官戒詩二十四首贈陶韋庵同年〔淑〕辛廣靈與詩集重校）。集中原文體分，實則各體文章之間互有交叉，或可同參並觀，或可予以歸併。他的文章，主要是以下四類：

一、傳記，包括傳、墓誌銘、墓表、行狀等，合計篇數幾及全集三分之一。其重要作品，約略以時代、年輩前後，臚列如左：

爲前輩人所作的傳記：倪文貞公傳、馬文毅公傳、先考府君行狀、左都御史金公檣門行狀、寶意先

生傳、隨園徵士邊君傳。

爲同輩人所作的傳記：江松泉傳、汪魚亭學博傳、溶川汪君墓誌銘、左中丞筠圃饒公墓誌銘、石蘭詩傳、越州七詩人小傳、龔一足傳、翰林院檢討伯庸田君墓誌銘。

蔣士銓所撰寫的人物傳記，大多爲其親朋故交、同鄉同年而作。有的真切詳盡，如先考府君行狀，述其父親蔣堅傳奇式的一生經歷，洋洋萬餘言；有的言簡意賅，如龔一足傳，記南昌龔夔困於童子，試五十年，重點突出其獨介兀傲、「不諧於時」的個性，全文還不到二百字。有的概述傳主的家世、生平，有的兼及其詩文著述以至遺聞軼事，有的更綴以「太史氏曰」、「論曰」一段論贊。有時作者還聯繫到與摯友幾十年的交往歷程（如汪魚亭學博傳），或因親友物故而引發的身世之感（如左中允筠圃饒公墓誌銘）。有的傳主在文集中凡數見，如左都御史金公檜門行狀，記述他的恩師金德瑛一生的主要事迹，若參以金檜門先生遺詩後序、檜門先生畫像記、檜門先生書揭跋、同李敬齋趙大經公祭都御史金公檜門先生文等篇，則可以多側面地瞭解其正直、淡泊、好學深思的品德以及師生情誼之切和作者文學思想的淵源所自。有多人的合傳，如爲劉文蔚等所作的越州七詩人小傳，也有側重詩人行誼的詩傳，如爲女詩人胡慎儀所作的石蘭詩傳。總之，蔣士銓的人物傳記，形式多樣，不拘一格。行文之略，記叙之繁簡，則因人、因事而異。敘述方式，以順叙居多，也有倒叙、插叙；有先叙而後議，也有先議而後叙，而更多的是夾叙夾議。傳記文雖重在敘事，但也不乏形象的描寫和生動的細節（如石蘭詩傳、隨園徵士邊君傳）。

二、序跋，主要是詩序和書畫跋兩類。

蔣士銓的詩序在評論詩作者的同时，常藉以闡發自己在詩和文學方面的觀點，如邊隨園遺集序、鍾叔梧秀才詩序、沈生擬古樂府序等均是。胡簡麓秀才詩序論述詩品與人品的互爲表裏，趙雲松觀察詩集序涉及創作與生活的關係問題，均有精到之見。何鶴年遺集序、柳村遺草序既述其詩歌的卓爾不羣，復憫其一生遭際之坎坷，直可視爲作者爲何在田、劉大申所作的兩篇傳記。

蔣士銓精於書畫的鑑賞品評，跋文衡山書後、裱跋李書樓墨刻各帖、書李北海景君碑跋、自書黃庭經跋論評歷代書法名家的風格、源流、得失、真贋，或旁徵博引，或妙用比喻，表現了作者對書法藝術的淵博知識和精深見解。錫山吳省曾畫像冊跋贊吳省曾寫真得波臣派真傳，兼論畫貴神似；新安兩布衣詩畫卷跋贊吳雯、炯「詩情澹遠」，吳麐「有衡山風致」，同時又「皆寓公之有品者」，可以看出作者品評詩書畫時的獨特視角。後遊蘭亭圖跋描摹作者與劉達夫、劉豹君等十一人遊蘭亭時的情景，圖中人物各不相同的狀貌、服飾、姿態、動作，宛然在目，堪稱傳神之筆。

三、雜記，主要是文集中以「記」名篇的這一類作品。

作者所寫的題畫記爲人所稱道。鳴機夜課圖記叙母親鍾令嘉辛勤撫養、教育自己成長的過程，感情深摯，筆調細膩，是蔣士銓散文的名篇之一。歸舟安穩圖記描述脫離宦海風波後的恬適心境，表達辭官歸去的決心，也是一篇富有詩意的優美散文。

蔣士銓篤於友情，尤其是對處於困境中的友人，每寄以深切的同情，或助之於生前，如對蘄樹椿，